

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新发展

——谈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成就

吴 济 时

在文艺创作中,工业题材创作是个“老大难”问题。然而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情况发生了值得重视的变化,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兴旺景象。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创了新局面。在他之后,又有一批中、青年作家继起。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获得高度评价的短、中、长篇,达二十多个,成功塑造了不少血肉丰满、真实感人的工业战线的人物形象。人才济济,鲜花竞放,这种盛况,是建国以来不曾见过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已摆脱了落后局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批崭露头角的作家中,蒋子龙最具代表性。不仅因为他是新发展阶段的一个走在前面的开拓者,他用成功的作品完成了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并不断作出新贡献;而且因为他写工业题材起步,恰好是前一个阶段的末期。他走过的道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发展过程。因此,认真总结他的创作经验,对认识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新发展,探索它的发展规律,对进一步繁荣和提高工业题材文艺创作都十分有益。



蒋子龙对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新发展,首先在于他摆脱了从理念出发的束缚,突破了“两种方案,争论不休”的老套子,勇敢地从生活出发,对现实关系进行真

实描绘。他展现的是工业战线的真实图景,提出和回答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作品中跳动的是时代的脉搏,发出的是人民群众的心声。他的作品,不再是“车间文学”“工厂文学”,而是社会的文学。

建国以来,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中也有较好的作品出现,但总的来看,却一直未摆脱落后状态。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作家对工业战线生活不熟。建国后的若干年里,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随时间推移,对生活在工业战线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作家来说,这个问题应该不存在了。又有人认为工业生产问题、技术问题既复杂又单调,很难写好。的确,钢铁是冰冷的,技术是枯燥的。但这决非工业战线生活的全部,从已出现的比较成功作品看,它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唯意志论的干扰和破坏。所谓“写生活的本质”的观点,对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的禁锢可说是最厉害的。不是说不应该反映生活的本质,而是说这种主张存在着片面性,它有个一律要求一成不变的概念: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写工业题材只能歌颂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和它的先进性。这种理论,把作家从现实主义道路上,逼上了从理念出发的歧路上。谁违反,谁倒霉。刘宾雁及其《在桥梁工地上》^①的遭遇是最典型的,甚至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艾芜的《百炼成钢》,也曾受到指责。艾芜说:“我在拙作《百

炼成钢》中写了两个有缺点的工人，就有人向我讲，你应该把三个工人都写成英雄人物、模范人物，而且彼此没有矛盾，始终和衷共济，这才是我们新中国工人阶级应有的好现象，你写了两个有缺点的工人，损坏了新中国工人的面貌。”^②这就是说，“写生活的本质”论者，根本不允许写工人阶级队伍中的缺点和问题。直到六十年代初，对唐克新的《沙桂英》的指责，还在重复上述论调。到“四人帮”横行时，这种左的思潮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更给整个文艺事业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

由于左的思潮长期作用的结果，工业题材文艺创作普遍存在现实主义精神不足的问题。作家只能在框定的狭小的领域里施展，除写回忆对比、好人好事、好与更好的矛盾外，创作上出现了一个畅行无阻比较保险的套子：“两种方案，争论不休，书记先进，厂长落后，发明创造，工人带头，技术人员，崇洋保守，试验失败，敌人暴露，落后转变，共同奋斗。”后来发展为“写路线斗争”，这种方案是正确路线的体现，那种方案是错误路线的体现。不能说类似的矛盾生活中没有，若写得好，也可以写出好作品。问题在于它不能成为一种模式，不能把复杂多样的现实关系概念化，简单化。一九七二年蒋子龙的第一篇工业题材的小说《三个起重工》，虽着力性格塑造，但它的基本矛盾却是以上模式的翻板。

蒋子龙毕竟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开拓者，他很快发现自己“不是根据生活进行创作，而是用现成的套子去套生活。”^③他决心冲击旧有的模式。一九七六年初发表了引起轰动的《机电局长的一天》，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人民的愿望。但是，在那时，现实主义是违背帮规帮法的，蒋子龙因此挨了棍子。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才为他的创造性的劳动开辟了广阔天地。

蒋子龙从生活出发，对现实关系进行真实描绘的特点之一，是站在时代的高处观察生活，从生活的激流里选取题材。他说：“不懂工业写不好工业题材，只懂工业也写不好工业题材”，“从生活的大动脉着手，工业文学这盘棋就可以活起来。”^④又说：“真正的艺术品，都有那个时代的高度。”^⑤但是，“在时代的下面，想反映这个时代是不行的。”^⑥因此，他总是努力站在时代的高处俯览全局。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搞外交活动失败，作家曾有一番评点，乔光朴不知道“他的宏伟计划和现实之间还隔着一组织混乱和作风腐败的鸿沟。”这个论断反映了蒋子龙是站在时代的高处观察生活的，他看出了新旧交替时期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重大问题。他所把握的这个矛盾冲突，不是来自理念，而是来自生活。这个观察结果成为他许多作品的矛盾冲突的现实基础。《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取材于整顿、改革与阻碍乃至反对整顿、改革的斗争；《开拓者》、《赤橙黄绿青兰紫》、《十字路口》取材于改革体制、经济革新、引进技术、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人事厂长》则取材于新形势下权力追逐的冲突。他不再单纯地表现好人好事、生产过程、技术问题，而是把工业战线作为整个大社会里的一个小社会，把触角伸进生活的五脏六腑之中，感受生活，把握生活，然后以工业战线为舞台，以整个社会为背景，表现现实生活中一场场五彩缤纷、抑扬激越的活剧。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不仅见到了气象万千的工业战线；同时，它们又象时代的窗口，通过这些窗口，我们见到的几乎是正在除旧布新的整个时代。

蒋子龙从生活出发，对现实关系进行真实描绘的另一特点是尖锐地、勇敢地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矛盾进行深刻地揭示，激励人们去解决问题、战胜困难、除旧布新。

蒋子龙说：“我的工厂就是我观察社会的‘雷达站’经营了几十年。我对它太熟悉了，

熟悉它的每根神经。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通过它可以了解中国和世界（主要是机械行业）这个大社会。”⑦经过十年动乱，我们面临的是问题成山，百废待兴的局面，工业战线同样如此。然而实现“四化”就是要在这样的现状的基础上重新起步。看不清这点，不可能提出拨动人们心弦的社会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可贵的是蒋子龙更从经历十年动乱之后的我们的党、干部和人民，看清了实现“四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我们时代不可抗拒的主潮。他说他总是努力使“创作时所选择的矛盾既符合生活的真实，又能反映那真正触动千百万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现实问题。”⑧新的长征需要有带着队伍向前冲的新的带头人，带头人如何，是人都关心的。他提出的具有普遍性和迫切性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必须改变某些干部和管理体制同实现“四化”的要求，同经济发展的规律不相适应的状况。这就不再是工厂里的技术问题或生产上的方案之争，而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对这个问题，他在作品中进行了集中反映。他满腔热情歌颂了“四化”创业者，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新长征中的当代英雄、老一代革命战士的新风貌，又看到了新一代“四化”创业者的成长和他们的科学态度、敢作敢为的创业精神。同时他也把干部中的“政治衰老症”、把安于外行，混社会主义、把僵化保守、把好大喜功，搞瞎指挥、把极左、把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无政府主义、把多种多样的现实的“关系网”，放置在文学的手术台上进行解剖。帮助我们看清了这一切是怎样贻误工作，怎样阻碍甚至破坏“四化”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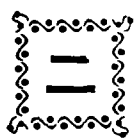
蒋子龙创作的深刻性还在于他从社会风尚更深一层揭示了“四化”进程中的重大障碍，从某些领导层中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乔光朴那样的当代英雄遇到了两个不易跨越的障碍，一是“厂外的‘战友’不跟他合作，却使他束手无

策。”另一个是冀申掣肘。

乔光朴不懂“关系学”，在搞外交活动中失败。发人深思的是乔光朴从正道解决不了的问题，靠祁望北走邪道送人情，拉关系解决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更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被不正之风扭曲着的干部的灵魂和他不得已而为之的苦闷。假如不抓紧解决不正之风的问题，不对社会风尚加以净化，很难想象金凤池、祁望北会“滑”到什么地方去，很难保证作为乔光朴的助手的祁望北，将来一定不会成为乔光朴的对手。这就是作家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绘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冀申为什么被撤了厂长职务之后，可以越过厂党委被提升为外贸局副局长？为什么敢于通过争夺产品外销权坑害重型电机厂和乔光朴？吴昭年那种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诬陷别人，用人民的血汗换取自己高升的人，为什么能青云直上？不就是因为在他们的上面有那种置党的原则于不顾，图报个人“恩情”的人吗！就是有那种好大喜功、盲目自信的官僚主义者吗！作家在这里揭示了某些领导层中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党风问题。陈云同志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话是很深刻的。党中央正在雷厉风行大抓整顿党风，大抓精神文明建设，党风好转，必然促使社会风气好转，这样，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更有根本保证了。

蒋子龙说：“文学是墨写的，但构成文学的却是生活的血肉和时代的脉搏。”⑨正因如此，所以他的多数作品都能触动千百万人的思想感情，博得广大群众的喜爱。而这一点是那些从理念出发的公式化的作品所达不到的。



蒋子龙对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新发展的集中体现，是跳出了图解理念的模式，着眼于写“社会的人”。他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工业战线上的人物，各种各样的干部、

新、老工人以及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不再是“工厂的人”，其中有些已达到典型的高度，如乔光朴、金凤池、解净等，有些人物如霍大道、车篷宽、刘思佳、冀申等，也都有相当的典型性。

建国以来，工业题材小说中，也有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如《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在和平的日子里》的闫兴、梁建，《沙娃英》中的沙娃英，《特殊性格的人》中的王刚等，但为数不多。作家们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塑造人物往往落在模式之中，概念化、雷同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又由于题材选择和矛盾设置局限在工厂内的生产问题或技术问题，所以只能写出作为生产者或生产组织者的“工厂的人”。更多的作品是见事不见人，人物被事件淹没了。

蒋子龙突破了旧有的人物塑造的模式，开创了新局面，走出了新路子。他说：“我写工业战线上的人物，但只是把工厂作为人物活动的舞台，以整个社会做为背景，表现的是‘社会人’”。^⑩表现“社会人”，本来是文学创作中，众所周知的问题。但是，从工业题材创作状况看，不能不肯定从写“工厂的人”到写“社会的人”是一个重大发展。“把工厂作为人物活动的舞台，以整个社会为背景，表现的是‘社会人’”，是蒋子龙的发现，是他摸索出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的经验。

蒋子龙塑造的“社会的人”多种多样。其中成就最高、最有光彩的是具有进攻性格的“四化”创业者。

进攻性格是我们时代孕育的、寄托着人民的理想、要求和愿望的性格。这是一种极可宝贵的性格。从一九七二年写《三个起重工》起，他就开始了对这种性格的探索，到一九七六年初，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机电局长的一天》中，比较成功的塑造了霍大道的英雄形象。进入新时期后，他更自觉地把塑造“四化”创业者的形象，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进攻性格的探索到了结出硕果的时候。他在成功塑造了当代英雄的典型乔光朴之后，又塑造了锐意改革的开拓者车篷宽，新一代的“四化”创业者解净和应丰、凌子中、高盛五、路永存等等。这是蒋子龙的各具个性的“四化”创业者群。

具有进攻性格的“四化”创业者，既不是在“方案之争”中“争”出来的，也不是那种写工厂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斗”出来的。而是在两种性格，两种世界观，两种对立的生活原则的冲突中塑造的。他们是奋战在解决重大的社会矛盾阵地上的时代的英雄，是应新的历史使命的召唤而出场的时代的主角。

《乔厂长上任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象重型电机厂那种靠提政治口号指挥生产，长期完不成任务、工作稀松马虎、人事纠纷复杂，政治思想混乱的厂，在当时并不少。这个厂是我们在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问题成山，百废待兴的局面的一个缩影。现实需要开创新局面的人，正象乔光朴说的：“‘四化’的目标中央已经确立，道路也打开了，现在就需要有人带着队伍冲上去。”然而，在这样的重任面前，在机电局党委扩大会上却出现了沉默。这种沉默与乔光朴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他有了“毛遂自荐”、“立军令状”的行动。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中，碰出了乔光朴性格的火花，他的无私无畏，以革命利益为重，刚毅果决，迎难而上的革命战士的性格，一下子就突现了出来。

但是，这个性格的完成，却是在他上任之后，在解决尖锐重大的社会矛盾的斗争之中。重型电机厂存在着“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门的问题，”不仅是个烂摊子，而且是个政治漩涡。他的主要对手是神通广大，精通关系学的小官僚冀申。乔光朴毕竟是一个成熟的老战士，是有经验的企业家，他在摸清了情况之后，决定动大手术。首先是在局党委领导和支持下，撤换了前厂长冀申，又提拔了年轻有为的祁望北当主管生产的副厂

长，重用了技术专家童贞，这样他就组建了一个包括石敢在内的，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很强的领导班子。同时坚持实行厂长负责制，改变了那种无政府状态。通过大考核、大评议，成立编余“服务大队”整顿了职工队伍，又建立了物质奖励和产品检验制度等，不久就扭转了完不成任务的被动局面。这场斗争是“四化”创业者与“四人帮”遗留的祸害、与官僚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正之风的较量。作家正是通过这些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特征的解决矛盾冲突的事件，突出了乔光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思想作风，不计个人恩怨，任人唯贤的高尚品质，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懂得经济规律，具有现代科技知识的企业家的雄心、魄力和才能。《乔厂长上任记》问世，给新长征注入了一种一往无前的豪气。

但是，蒋子龙笔下的“四化”创业者，包括乔光朴这样的当代英雄，都不是“高大全”，不是法力无边的神。现实生活是复杂的，作者没有把冀申简单化，在整个较量中，乔光朴也有逆境，他容易激动，不够冷静，有过碰壁之后的苦恼和牢骚，有对来自友谊的支持和来自爱情慰藉的要求，他是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

蒋子龙塑造的人物所以称得上是“社会的人”，关键在于他善于从工业战线的生活中提炼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矛盾，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完成人物的塑造。乔光朴是这样塑造的。其他“四化”创业者也都是这样塑造的，即使取材于工厂生产上的具体问题，如用五百吨快锻钢筋水泥基础的质量事故写成的《基础》，他也决不就事论事，既不是单纯写技术问题，也不是搞方案之争，而是从这场事故中，提炼出认真负责于社会主义和混社会主义这种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矛盾冲突，从而塑造了车间主任路永存这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四化”创业者。

蒋子龙塑造的“社会的人”，是复杂的社会生活孕育的复杂的人。是随着尖锐复杂的

社会矛盾冲突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我们的时代是新旧交错，除旧布新的时代，新的东西正在斗争中成长，旧的东西、十年动乱遗留下的祸害却又顽强存在，并继续毒害着人们的心灵。作家在《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中，通过塑造金凤池，使我们看到了不正之风怎样扭曲一个较好的干部的靈魂。

金凤池本来是个既有管理经验，又有才能，关心群众，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可是，在不正之风之中，他不是一株挺得住的大树。对不正之风他深为不满，既不想凭借这股风青云直上，也不想从中得到其他个人私利。但对不正之风又无可奈何，他自作聪明地断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打开一切大门口的钥匙——是金钱。在我们国家能够打开一切大门口的钥匙——是搞好关系。”于是，他随波逐流了，他还为自己的行为找出了合理性：“我们是小厂子、小干部，要地位没有地位，要权势没有权势，再不吃透社会学、关系学就寸步难行。”他变得圆滑了，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干他不愿干，又似乎不可不干的事。每次到化工局开会，他都挨个进领导机关的各办公室“拜年”，递好烟，陪笑脸；对下、对同级则多方讨好；对那个权欲薰心，心狠手毒的副厂长骆明，他甚至要点权术，施以小恩小惠，予以拉拢。对来自各方面的矛盾，他似乎都可以对付。但他的内心里，却又随着矛盾的解决而产生痛苦。

作家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既写出了金凤池的缺点、错误，他的片面性，又如实地写出了他“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他内心严肃的一面。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概念去鉴别他，有时候“好”和“坏”，原则性和非原则性在他办的同一件事上一起表现了出来。作家对他的同情多于对他的批评。他的创作的主旨，在于揭示不正之风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发现并成功塑造这个典型，是蒋子龙的现实主义深化的表现。通过金凤池，使我们更深

她认识了复杂的现实生活。

《赤橙黄绿青兰紫》中的解净，不同于金凤池，她在复杂的、变化着的现实生活中，经过思想裂变，领略了生活的真谛，认定了方向，便昂首挺进。任何困难和阻力，都动摇不了她的决心。

十年动乱之中，年轻的解净被磨炼成一个畸形的“接班人”。她“纯洁得不能再纯洁了”，虔诚得近乎愚昧，她被那些貌似革命的极左的理论和口号迷惑了。她入了党，也认识到“她这样两手空空地走进来，好象对不起党，亵渎了党的尊严。”但是，怎样才对得起党，她并不明确，她以为跟着喊些极左的口号，搞些空对空的宣传，就可以弥补心中的缺憾了。恰恰是这样做了，她得到了党委书记的器重，于是，她由一个普通工人被提拔为宣传科的副科长。

“四人帮”倒台后，实现“四化”的任务重新提到了面前。“空头政治”不吃香了，“石头政治”不灵了，解净由接班人变成了处处吃白眼的多余的人。她的思想发生了裂变：“现在她感到自己心里的长城一下子垮掉了，过去她视为很崇高很重要的工作，原来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甚至有许多是空对空的，是糊弄人的，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她觉得空落落的，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这些年白耽误了。”于是她坚决要求到基层去，要去学点扎扎实实的本事。她到了汽车队，同事们的冷落，“刺儿头”的恶作剧，学技术的艰辛，她都不怕，她起早摸黑，甚至日以继夜，学开车，研究经营管理，在生活的摔打中，她进一步认识了自己，也学会了了解人，依靠人，做扎实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成为新时期造就的、有技术、有才能、有魄力的年轻的“四化”创业者，一个受到青年爱戴的名符其实的接班人。她不再是“单颜色的”，而是“全颜色”了。解净所走的道路，对当代青年有极大的启发性。

这类人物中还有刘思佳、路凯、姚一真

等，他们都是在复杂的生活中孕育的，都给你以似曾相识的感觉，具有很大的社会认识作用。

蒋子龙塑造的“社会的人”中，还有冀申、徐进亨、吴昭年这类被批判的人物。对这些人作家也没有把他们简单化，他们既不是图解理念的工具，也没有被贴上什么阶级的标签。他们是新旧交替的新时期中活生生的存在，作家既尖锐、生动地表现了这种存在，又探索了他们存在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原因，并且注意观察了他们的趋向。

靠说大话、说空话，迎合上级，靠说假话，诬陷别人，不惜用人民的血汗换取自己高升的吴昭年，是“大跃进”年代出现的，可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他还是身居要职，还在耍弄故技，并且有着市场，这是作家通过塑造人物提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徐进亨这种性格出现较晚，他是那种遇到困难就要进医院，害着严重的“政治衰老症”的人。这种病症泛滥于十年动乱后期，粉碎“四人帮”后，为医好这种病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可是，在《乔厂长上任记》中，在机电局党委扩大会上，我们又见到他，还不见他的病情好转。对乔光朴“毛遂自荐”感到惊诧，不理解的，就是他，帮助冀申在霍大道面前争乔光朴空出的“美缺”的也是他。

冀申这种人特别值得注意，虽然他不是卖身投靠“四人帮”的败类，也不是思想僵化的“凡是派”，但他诡谲多诈，“神通广大，是个孙悟空式的人物”。他趋时善变，长于投机钻营，上可影响市委书记，下可左右一帮人。他“处理一切事情，都把个人的安危、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明地斗不过乔光朴，就暗中捣鬼，出于个人恩怨和“小人得志”的报复心理，他在捞到外贸局副局长职位后，还要利用职权坑害重型电机厂和乔光朴，完全置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于不顾。从他身上已经很难嗅到共产党人的气味了。作家通过塑造这些人物提出的问题是发人深思的。

通过以上分析,把蒋子龙塑造“社会的人”的经验归纳起来,最重要的是两条:一,作家必须深刻了解、并善于把握、表现现实的生活和斗争,通过工厂生活的血肉,揭示社会性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为塑造“社会的人”提供独特的典型环境,才有可能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二,“社会的人”的行为和动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性的矛盾中引起的、决定的,并在处理矛盾冲突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蒋子龙在写工业题材的作品中,创造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气势宏伟,雄浑深沉,粗犷豪放,尖锐泼辣,具有与现代化大工业的气派相适应的美。他的风格的形成,也是三十多年来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中的出新。

题材的选择与主题的提炼,为蒋子龙的风格定下了基调。

蒋子龙的风格,既不是在写一般的回忆对比,好人好事中体现的,也不是在写方案之争中体现的。他是一个与时代保持着密切联系,自觉地以“加速生活脉搏的跳动,激发生活的动力”^①为自己崇高职责的作家,他惯于从生活的激流中去选择那些重大的、紧迫的、带有全局性的题材,表现那些激动自己的心灵,也能引起别人深思的矛盾冲突。题材选择与矛盾设置具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势。“四化”重新起步的初期,他就把面对重重困难的现实,作为党的负责干部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样事关全局的问题,在《乔厂长上任记》中尖锐地提了出来。深刻地批判了那种见困难就躲,见好处就伸手的个人主义,热情歌颂了乔光朴勇挑重担,迎难而上的革命精神。在改革体制,经济革新过程中,他又通过写《开拓者》揭示改革与阻碍乃至反对改革的斗争。从工厂写到工业局,到省委书记之间,以至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专业会议上,并且把笔触由经济领域伸进政治领域、思想

领域以至人的灵魂深处,气势宏伟,笔触犀利,高屋建瓴,纵横捭阖,对那种带着极左色彩的瞎指挥,对思想僵化保守,对腐蚀人的灵魂的“关系学”进行了尖锐地揭露和强有力地批判,在斗争中,成功塑造了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车篷宽的生动形象。其他象《解脱》、《乔厂长后传》、《人事厂长》、《赤橙黄绿青兰紫》、《十字路口》等无不是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重大题材。蒋子龙直面人生、有胆有识,针砭时弊,一针见血。但他的作品与悲观主义、怀疑主义是绝缘的,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的是凛然正气,见到的是烛照前途的火光。

具有进攻性格的“四化”创业者的塑造,是蒋子龙的风格的重要体现。

蒋子龙有一个包括乔光朴、车篷宽、解净等在内的,具有进攻性格的“四化”创业者群。这些人是自觉肩负着时代使命,富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的创业者。他们思想解放,作风果决,敢辟新路,敢于开创新局面,具有排难除险,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

由于题材是从生活的激流中觅取的,表现的是重大的矛盾冲突,而在人物的塑造上,又着意于具有进攻性格的“四化”创业者的塑造。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结构与文笔必须与他表现的题材、所要刻画的人物相契合,决定了他只能象作泼墨的山水画或大型的油画那样,大笔涂抹,场面和情节开门见山,大开大阖、简洁明快。他惯于把这些人物置于尖锐而紧迫的情势之中,让人物很快作出反映,紧接着是一个接一个的幅度大而强烈的行动和精炼的心理描写,表现人物在矛盾冲突中所显示的性格特征。象霍大道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豪情,乔光朴勇挑重担,迎难而上的品格,车篷宽的思想敏锐,勇于革新的胆识,应丰的坚持原则,一尘不染的情操,解净的善于思考,敢闯新路的气魄等等。这些作品的主角的风貌,无疑都成为作品的

底色，是蒋子龙的风格的重要体现。

特别要强调的是，蒋子龙写这些人物往往是以斗争的参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一场或那一场斗争中，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形形色色的阻力，他同他的人物都是同呼吸、共爱憎并肩在紧张地活动着。人物的精神状态，斗争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交融在他们如何战胜困难，克服阻力的斗争之中。风格是作家精神面貌的显现。既然如此，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他的美学理想，他的革命豪情，必然会在他热情歌颂的人物的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来。

炽烈情感的流露和精辟议论的抒发为蒋子龙的风格增添了色彩。

正是由于作家与他歌颂的人物同呼吸、共爱憎，所以在整个叙述和描写中，作家的炽烈的爱憎情感随时都流露出来。甚至有时作家还嫌字里行间的流露不够，禁不住自己站出来议论一番。比如乔光朴“毛遂自荐”后，委员们大吃一惊，这里，作家有一番议论：“是啊，他的请求太出人意外了，因为他现在的位子太好了。‘公司经理’——上有局长，下有厂长，能进能退，可攻可守。形势稳定，可进到局一级，出了问题，可上推下卸，躲在二道门内转发一下原则号令，愿干者可以多劳，不愿干者也可少干，全无凭据，权力

不小，责任不大，待遇不低，费心血不多。这是许多干部梦寐以求而又得不到手的‘美缺’。”这段议论尖锐泼辣，击中要害。有人提出蒋子龙的作品议论过多，存在直和实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段议论，既交代了乔光朴“毛遂自荐”的客观势态，映衬出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又写出了徐进亭、冀中等官僚、市侩、混社会主义的贪婪，丑恶的心理，真是画龙点睛，不嫌其多。类似例子，在作品中不少。

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正处在新发展的开端，蒋子龙已经作出了可喜的贡献。但是，从工业题材的创作现状看，具有历史深度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的大型画卷，还没有出现，工人中的“四化”创业者典型和其他更多更大的典型还有待于创造，题材开拓也不够宽。希望蒋子龙能作出更大的、更与我们时代相称的贡献。

注释：

① 这篇作品与现在写真人真事的特写不同，它可以作为短篇小说看。

② 艾芜：《关于三十年文艺的一些感想》。

③至⑪ 均见蒋子龙谈创作的文章：《杂记三篇》、《时代·文学·作家》、《“雷达站”及其他》、《跟上生活前进的脚步》、《大地和天空》、《加速生活的脉搏的跳动》等。

（上接第77页）

四 介词性用法

“之”字的介词性用法，主要是与其他的词组成介词结构在句子里作状语。在这些句子里，“之”字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到”。例如：

(79) 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鄘风·柏舟》

(80) 髡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鄘风·柏舟》

毛传：“矢，誓。靡，无。之，至也。至己之死信无它心。”“之死”就是“到死的时候”的意思。可译成“到死发誓没有它心”，“到死发誓没有邪念”。“之死”表示“矢”的时间，所以是状语。

注释：

①② 《四书五经》第255、120页。

③ 《马氏文通校注》下册，第316页。